

国际政治科学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012/2

■ 邓子立
王翠文

冷战后中国何以参与非洲维和行动

■ 徐 进

春秋时期“尊王攘夷”战略的效用分析

■ 杨 原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 (2008—2011)

■ 江忆恩

中美关系的稳定性和不稳定性

■ 威廉·卡拉汉
卡宁汉-克洛斯

古代中国权力与当代中国思想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国际政治科学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目录

CONTENTS

II 作者简介

- | | | | |
|-----|----------------------------------|--------|---------|
| 1 | 冷战后中国何以参与非洲维和行动 | 邓子立 | 王翠文 |
| 38 | 春秋时期“尊王攘夷”战略的效用分析 | 徐 | 进 |
| 62 |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2008—2011) | 杨 | 原 |
| 107 | 中美关系的稳定性和不稳定性
——回应阎学通的“假朋友”理论 | | 江忆恩 |
| 133 | 古代中国权力与当代中国思想 | 威廉·卡拉汉 | 卡宁汉-克洛斯 |
-

162 注释体例

冷战后中国何以参与非洲维和行动

邓子立 王翠文◎

【内容提要】 本文试图探讨冷战后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的原因。作者发现，冷战后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并非单一的线性变化，而是经历了参与度“次高→较低→较高”的转变。本文从理性分析视角出发，假设中国对预期收益较大的非洲维和行动，将付出更高的成本参与其中。通过分析冷战后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的各项收益与成本因素，本文试图分析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成本—收益”的理性逻辑。笔者的研究结论是，理性逻辑能够有力地解释中国参与的大部分非洲维和行动，即符合预期收益大于支付成本的标准，但仍有相当一部分并不能用理性逻辑进行有力的解释，即存在部分理性缺失的情况。

【关键词】 中国 非洲维和 理性 成本 收益

冷战结束以来，随着经济快速增长，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更为密切，同时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中国对非洲的交往中，随着中国在非洲的海外利益凸显，中国外交面临着更多新的问题。据新华社报道，2012年1月28日，中国中水电公司在苏丹南科尔多凡

州一个工地遭到反政府武装分子袭击, 20 多名中国工人下落不明, 随后经多方斡旋与营救, 被劫持的中国工人安全返回中国 (其中 1 人因负伤死亡)。^① 这件事情折射出一系列关于中国发展的疑问: 在中国与世界联系越来越紧密的今天, 中国应该如何有效地保障海外利益的安全? 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 如何处理好与大国、周边国家以及其他国家的关系? 在实现国内现代化目标的进程中, 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以及应该如何发挥作用? 本文选择冷战后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为议题, 这对上述问题的思考也许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是: 冷战结束以来, 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是否发生了转变? 如果是的话, 那么发生了怎样的转变? 如何解释上述转变? 在对本文的问题进行阐述之前, 首先需要对上述问题涉及的核心概念作简要的说明。“维持和平行动” (以下简称“维和行动”) 是指“经有关各方同意, 由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建立, 由联合国控制和指挥, 依靠联合国会员国集体出资, 由会员国自愿提供军事和其他人员以及相应的设备, 在冲突各方中公正地行动并且在必要时最小限度地使用武力, 旨在试图控制和解决冲突的战地部队”。^② 所谓“参与”是指中国就维和行动所涉及的相关行为, 本文主要从实际派遣、经费分摊、官方发言以及投票记录等方面来考察中国参与联合国非洲维和行动。

一、冷战后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的转变

回到开篇提出的问题: 冷战结束后, 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是否发生了转变? 如果是的话, 发生了怎样的转变? 本文希望通过详实的数据分析来说明冷战后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的情况。

根据冷战后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的参与比例 (见图 1), 笔者以

① <http://world.people.com.cn/GB/1029/42359/16972402.html>.

② Marrack Goulding, “The Evolution of 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69, No. 3, 1993, p. 455.

1999 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1999 年以前为参与比例较低阶段，1999 年以后为参与比例较高阶段。在此基础上，根据中国代表的官方发言^①与人员派遣的特征，笔者将上述两个阶段再细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接触参与、观望参与、恢复参与和扩大参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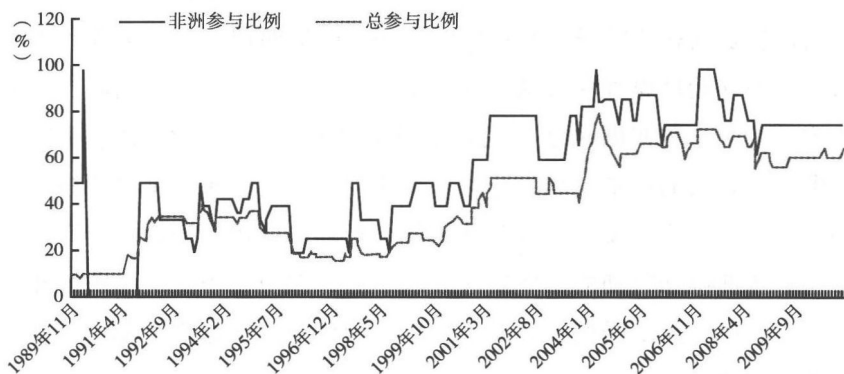


图1 冷战后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参与比例的变化

注：本文关于联合国维和行动数据均从联合国维持和平网站 <http://www.un.org/en/peacekeeping/> 获取，后文不再一一标出。

第一阶段为接触参与阶段（1989—1991 年），中国开始参与非洲维和行动，但参与程度较低。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为：中国代表在官方发言上支持非洲维和行动，但从军事人员的实际派遣情况来看，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比例较低，主要派遣小规模军事观察员，在维和经费方面中国所占比例较小。在这一阶段，中国对非洲维和行动的参与主要是官方言论的支持以及象征性的军事人员派遣。不可否认，无论是维和政策的积极转变还是实际派遣的象征性突破，对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自此以后，中国始终对联合国维和行动在维护地区稳定方面的作用基本持肯定的立场。

^① 官方发言是指中国代表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的发言，以及在联合国维和行动特别委员会例会上的发言，具体文本可参考联合国文件系统、《中国外交概览》、《中国外交》、《人民日报》等。

第二阶段为观望参与阶段（1991—1999 年），中国开始谨慎观察非洲维和行动，在适应与学习中保持对非洲维和行动的参与。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为：中国基本保持较低的参与比例，派遣小规模维和观察员，在维和经费方面中国所占比例维持在较低水平，在官方发言上更多地强调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原则与宗旨。在这一阶段，中国不再一味地强调维和行动的和平贡献，特别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联合国遭遇前所未有的维和困境的时候，中国开始反思维和行动的问题所在，在适应与学习中阐明自身的维和政策。在联合国非洲维和行动进入快速扩张以及随后的低迷不振阶段后，中国持谨慎的观望立场，采取减少参与、小规模派遣维和观察员的做法，更多的是在官方发言上强调非洲维和行动应该遵循的原则与宗旨。尽管中国对非洲维和行动的一些做法表示不满，但由于中国对非洲维和行动参与十分有限，所遭受的损失并不严重，因此中国没有完全退出，而是持一种观望态度。

第三阶段为恢复参与阶段（1999—2003 年），中国转向相对积极的维和政策，逐步扩大对非洲维和行动的参与。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为：中国对非洲维和行动的参与比例开始增加，以《国防白皮书》的发布为标志，中国对非洲维和行动的政策与发言趋向积极，维和经费方面中国承担比例稍有上升，但中国仍然保持较小规模的人员派遣。在这一阶段，中国对非洲维和行动的参与在政策立场上有了明显的积极转变，中国政府高度肯定维和行动对非洲稳定的积极作用，并扩大对非洲维和行动的参与，维和经费分摊比例也有所上升。中国开始将更多的人力、物力投放到非洲维和行动的事业之中，但由于人员培训等方面需要时间，因此逐步扩大对非洲维和行动的参与有一个过渡阶段。

第四阶段为扩大参与阶段（2003—2010 年），中国继续推行相对积极的维和政策，进一步扩大对非洲维和行动的参与。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为：中国继续保持对非洲维和行动的较高参与比例，并派出较大规模的维和人员，特别是增加大量的军事部队参与，在维和经费方面中国开始逐步承担更大的比例，在官方发言方面中国更多地从维和行动改革与提高效率

方面提出建议。在这一阶段,中国主动派遣大规模维和使团参与新部署的非洲维和行动,并注重人员选拔、安全保护、舆论宣传等后勤保障工作,“维和”开始成为中国政府乃至中国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至此,中国已经形成相对成熟的非洲维和政策,同时国内也形成了相对完善的维和人员培训与选拔体系,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为中国提供了有力的财政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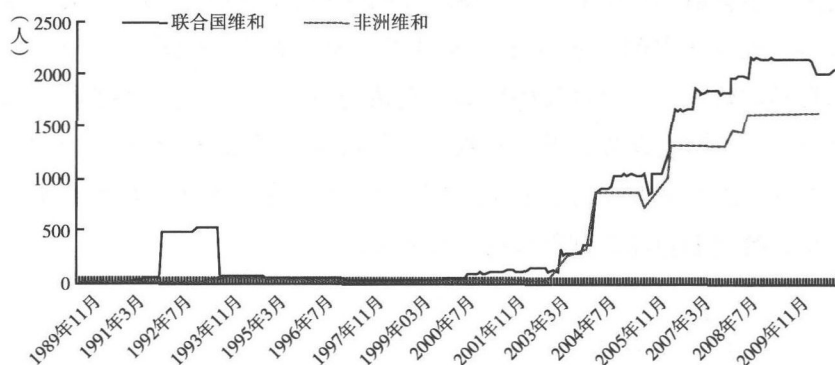


图2 冷战后中国对联合国维和与非洲维和行动参与规模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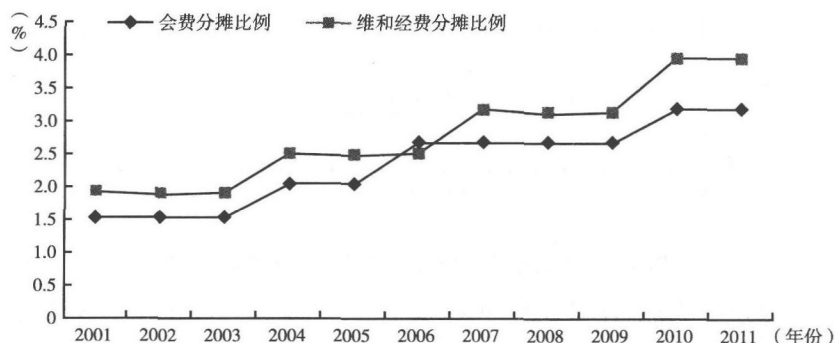


图3 中国向联合国缴纳费用分摊比例的情况 (2001—2011年)

资料来源: 联合国年度预算文件 ST/ADM/SER. B/568, ST/ADM/SER. B/582, ST/ADM/SER. B/597, ST/ADM/SER. B/612, ST/ADM/SER. B/638, ST/ADM/SER. B/668, ST/ADM/SER. B/701, ST/ADM/SER. B/755, ST/ADM/SER. B/789, ST/ADM/SER. B/824, A/C. 5/55/38, A/C. 5/56/36, A/C. 5/56/36, A/C. 5/57/22, A/C. 5/58/35, A/C. 5/59/34, A/C. 5/60/27, A/C. 5/61/18, A/C. 5/62/23, A/C. 5/63/23, A/C. 5/64/19, A/C. 5/65/15, A/C. 5/65/19, A/58/157, A/61/139, A/64/220。

中国在非洲维和行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本文以“参与度”来衡量中国对非洲维和行动的参与。“参与度”是意愿和行动的有机组合，意愿维度包括投票表决和官方发言两部分，而行动维度则包括实际派遣和经费分摊两部分。意愿维度、行动维度与参与度都是正相关关系：意愿水平越高，参与度也越高；行动水平越高，参与度也越高。根据前面对冷战后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的阶段特征，用意愿维度和行动维度界定的“参与度”来分析，可以看出冷战后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的转变。各个阶段中国参与度情况如下：在接触参与阶段，意愿维度较高，但行动维度较低；在观望参与阶段，意愿维度和行动维度都较低；在恢复参与阶段，意愿维度较高，但行动维度较低；在扩大参与阶段，意愿维度和行动维度都较高（见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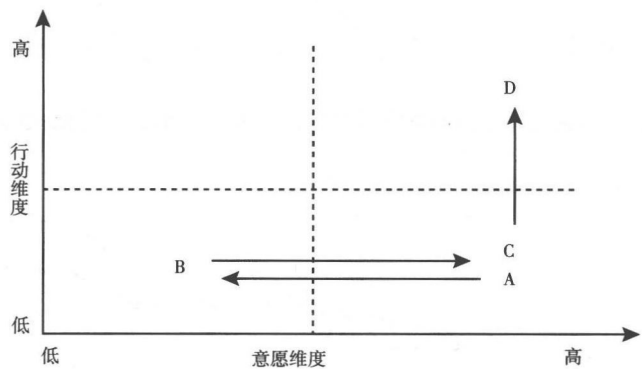


图4 冷战后中国对非洲维和行动参与度的转变

注：A（接触参与阶段）、B（观望参与阶段）、C（恢复参与阶段）、D（扩大参与阶段）

由图4可以看出，以参与度进行衡量，冷战后中国对非洲维和行动的参与并非单一的线性变化，总体而言，中国经历了参与度“次高→较低→较高”的变化。具体而言，冷战后中国对非洲维和行动的参与经历了“高意愿+低行动→低意愿+低行动→高意愿+低行动→高意愿+高行动”的转变。

二、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既有解释

有关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的既有文献主要是围绕以下两个问题展开的：冷战后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发生了怎样的转变？为什么会出现上述转变？

（一）冷战后中国参与维和行动的转变

对于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参与规模有所扩大的趋势，部分学者抱乐观态度，认为中国事实上以开放、自由的姿态参与到国际社会之中，笔者把这些学者称为“积极派”；也有部分学者并不认为中国在积极参与维和行动，在中国参与维和行动问题上持谨慎而保守的态度，笔者把这些学者称为“保守派”。

两派学者对于冷战后中国参与维和行动历史的不同判断也影响到对未来趋势的不同预期。积极派学者强调不断变化的国际安全现实，强调中国不断增加的国际联系利益，倡导中国从现实出发，对主权过于敏感只会阻碍中国国家利益的维护，应该以更积极的姿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以适当的方式推动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发展。^①与之相反，保守派学者认为中国参与维和行动是防御性的，表现为对主权原则的坚持，也表现在中国在安理会表决时往往采用弃权的投票方式。弃权被认为仅是权宜之计，是被动的反应，一方面，改变以往不参加投票的做法，表明中国愿意参与国际政府间组织；另一方面，中国对国际维和制度的承诺是软弱的，甚至更多时候表现出反对的态度，却又不愿意持否决态度而阻止决议执行。^②福拉瓦

① 代表性观点参见唐永胜：《中国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9期，第39—44页。

② M. Taylor Fravel, "China's Attitude toward U. 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since 1989," *Asian Survey*, Nov. 1996, pp. 1102-1121; 金淳基：《中国与联合国》，载伊丽莎白·埃克诺米、米歇尔·奥克森博格主编：《中国参与世界》（华宏勋、闫循华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45—87页。

尔 (M. Taylor Fravel) 将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困境称之为“既不能接受它, 又不能离开它”。^①

(二) 中国参与维和行动转变的原因分析

总体来看, 现有文献大致上从国际和国内层面探讨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原因: 遵循自外而内逻辑的代表性观点主要有“责任攸关论”、“工具理性论”、“国际合法性”; 遵循自内而外逻辑的观点仍不成熟, 并没有形成相关理论, 笔者称之为“国内视角”。

持“责任攸关论”的学者认为, 作为“责任攸关方”, 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原因在于把维和行动看做提供国际公共产品 (如国际和平与安全、人道主义保护等) 的一种可行方式。中国大部分的学者、官员都认同这一观点。^② 刘铁娃和张萍就指出, 中国维和政策以中国发展战略为基础, 并力所能及地为国际和平贡献力量, 中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 也是“自信、负责任的大国”, 这是中国参与维和行动的动机。近年来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贡献表明, 中国对外政策更多地考虑绝对收益而不是相对收益, 中国正在成为“责任攸关方”。^③ 张敬民认为, 维和政策是中国大国地位的体现, 这反过来表明中国已经担当起维护和保护现有国际体系的责任。“作为负责任的五大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 中国有能力并且有可能维护地区以及全球范围的和平与安全。”^④

持“工具理性论”的学者认为, 中国参与维和行动的根本动机在于

① Fravel, “China's Attitude toward U. 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since 1989,” p. 1121.

② 代表性观点参见 Tang Yongsheng,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UN Peacekeeping Regime,” in Wang Yizhou ed., *Construction within Contradiction: Multiple Perspectiv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Beijing: China Development Publishing House), 2003, pp. 73 - 99; 赵磊: 《“为和平而来”——解析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 《外交评论》2006 年第 1 期, 第 30—36 页。

③ Liu Tiewa, “Marching for a More Open, Confident and Responsible Great Power: Explaining China's Involvement in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Vol. 13, No. 1 - 2, 2009, pp. 101 - 130; Zhang Ping, “Remarks on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s Participation in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March, 2007, <http://www.regjeringen.no/>.

④ Liu, “Marching for a More Open, Confident and Responsible Great Power,” p. 124.

工具理性层面的原因，如确保自然资源获取、平衡大国力量等。实际上，持上述观点的学者多数聚焦在中国在非洲大陆的维和行动，因为非洲涉及中国诸多的物质与战略利益。随着中国在非洲的全面接触与渗透，中国对联合国非洲维和行动的贡献也不断扩大，有学者认为两者之间存在某种直接联系，即非洲自然资源或潜在市场可能导致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机制。^① 这些学者大多持现实主义的立场，他们认为物质收益或战略收益是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首要原因。持现实主义立场的学者认为，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使得一国保有或获得在国际体系中现有或预期的地位，并获取诸多私人产品。^② 对中国参与维和行动的动机，持现实主义立场的学者认为包括平衡美国实力、提升中国实力建设、塑造中国国际影响力以及确保关键私人产品（如能源、市场等）的获得。需要指出的是，在支持“工具理性论”的学者当中，有一些学者也承认非物质因素对中国参与维和行动的作用，不过他们认为非物质因素仅仅处于次要地位。^③

持“国际合法性”观点的学者认为，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是基于对“声望”和“国际合法性”的考虑。作为理性行为体，中国之所以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是因为中国相信从中能够直接获益（区别于“责任攸关论”的解释），虽然这种获益从本质上而言主要是观念上的（区别于“工具理性论”的解释）。这些学者强调中国渴望被视为国际社会中的“负责任”或“合法”的行为体，然而，他们并不认为中国参与联合国维

① See Martin Jacques,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and the Birth of a New Global Order*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09), p. 327.

② 关于维和行动是否“纯公共产品”的争论，有学者认为维和行动并非“纯公共产品”，因此维和行动会提供额外获益，如维和参与国在驻在国享有巨大的经济或政治影响力。参见 Davis B. Bobrow and Mark A. Boyer, “Maintaining System Stability: Contributions to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No. 41, December 1997, pp. 725 – 727.

③ See Erik Lin-Greenberg, “Blue Helmeted Dragons: Explaining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United Nations Peace Operations,” M. A., diss.,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2009, p. 11; Philippe D. Rogers, “China and 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in Africa,”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 60, No. 2, 2007, p. 77; Dennis J. Blasko, *The Chinese Army Today: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 176.

和行动主要为了维护人权或国际和平。相关研究认为,“在中国看来,参与维和行动被认为是履行对联合国或国际和平与安全承诺的一种成本较低的方式,同时也是缓解由于中国实力上升所带来的担忧的一种方式”。^① 季北慈 (Bates Gill) 和黄劲豪 (Chin-Hao Huang) 指出,塑造“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是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政策的主要出发点,特别是中国日益介入一些“高度敏感和潜在危险的行动”,如达尔富尔行动 (UNAMID),这表明中国致力于塑造积极的“国际形象”,并回应国际舆论针对中国与非洲问题国家发展关系的批评。^② 何银指出,中国的维和战略旨在“向世界表明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声誉与意愿,也是希望强化联合国在国际合作中的作用”。^③ 中国“维和外交”是向世界展示和塑造中国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工程中的组成部分。^④

从国内视角进行研究的学者比较集中地讨论:主权原则或不干涉原则对中国参与维和行动的影响。有学者认为中国对国家主权看法出现的灵活性是中国更加积极参与维和行动的原因。^⑤ 中国在维和立场上的灵活性使

①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China’s Growing Role in UN Peacekeeping,” *Asia Report*, No. 166, April, 2009, <http://www.crisisgroup.org/>.

② Bates Gill and Chin-Hao Huang, “China’s Expanding Role in Peacekeeping: Prospect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SIPRI Policy Paper*, No. 25, 2009, http://books.sipri.org/product_info?c_product_id=393.

③ Yin He, “China’s Changing Policy on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Institute for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Policy, July 2007, <http://www.silkroadstudies.org/new/docs/Silkroadpapers/2007/YinHe0409073.pdf>; 聂军:《关于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认识》,《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3期,第19—22页。

④ Bonny Ling, “China’s Peacekeeping Diplomacy,” *China Rights Forum*, No. 1, 2007, <http://www.hrichina.org/>.

⑤ Bates Gill, *Rising Star: China’s New Security Diplomacy*,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7, pp. 104 – 136; Bates Gill and James Reilly, “Sovereignty, Intervention and Peacekeeping: The View from Beijing,” *Survival*, Vol. 42, No. 3, Autumn 2000, pp. 41 – 59; Allen Carlson, “Helping to Keep the Peace (Albeit Reluctantly): China’s Recent Stance on Sovereignty and Multilateral Intervention,” *Pacific Affairs*, Vol. 77, No. 1, 2004, pp. 9 – 27; Pang Zhongyi, “China’s Changing Attitude to UN Peacekeeping,”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Vol. 12, No. 1, Spring 2005, pp. 87 – 104; Stefan Stähle, “China’s Shifting Attitude towards 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95, 2008, pp. 631 – 655.

得中国能够更加积极、频繁地参与维和行动，甚至在一些高度敏感的国家 and 地区，如苏丹达尔富尔地区。中国对“卜拉希米”报告（Brahimi Report）作出了积极回应，对非传统意义的维和行动表现出更大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并希望从之前的维和经验中吸取教训，寻求维护国际和平与稳定的有效方式。^① 然而，中国对维和行动表现出的灵活性也是有限的，尤其是中国对维和部队使用武力始终比较敏感，认为维和行动必须坚持两条原则：当事国的同意和安理会的授权。正是由于中国在维和行动中立场的灵活性是十分有限的，也决定了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只能是有限参与。^② 从国内视角出发，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对维和行动面临着两难困境：一方面，中国海外能源和利益的获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承担更多责任的压力，这些都需要中国在维和行动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考虑到自身的统一问题和民族问题，中国必须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坚持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坚持维和行动的基本原则。因此，有学者认为中国属于“刺激—反应”式的被动外交，中国需要逐步调整既往政策，实现外交转型。^③

在笔者看来，上述分析主要是阐述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后，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发生的积极转变，如维和人员派遣规模增加等；对于中国行为转变的原因，尽管有学者从“塑造国际形象”、“负责任大国”等角度进行解释，但仍缺乏较为全面的理论分析。

从分析视角而言，既有研究缺乏将物质与观念结合起来，并从成本与收益的权衡比较中分析冷战后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的原因。“责任攸关论”认为正在崛起的中国应该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但其更多的是从应然的角度进行价值取向的判断，并没有从国家现实利益角度回答

① Stähle, “China’s Shifting Attitude towards 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pp. 638 – 650.

② Pang, “China’s Changing Attitude to UN Peacekeeping,” p. 98.

③ 王猛：《达尔富尔危机：中国外交转型的挑战与契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 年第 6 期，第 35—40 页。

“中国能否承担更多国际责任，以及如何承担这些责任”的问题。因此，“责任攸关论”主要从应然角度分析中国参与维和行动的价值取向问题，而缺乏对实现国家利益的理性考量。“工具理性论”似乎站到“责任攸关论”的另一端，主要从理性角度分析中国参与维和行动的战略计算，并假定中国追求物质利益为主。然而，这种解释具有明显的逻辑漏洞，即从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到中国攫取海外利益之间的因果关系缺乏论证（这正是本文希望有所突破的地方），而且偏重静态分析的“工具理性论”也不能解释冷战后中国对非洲维和行动所出现的行为转变。“国际合法性”更多地强调中国对观念收益的理性考量，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工具理性论”的不足。从国内视角出发的学者一般从两方面进行展开：一方面，中国正处于以经济现代化为中心的发展阶段，投入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能力十分有限，因此希望以有限的维和部队派遣实现最大的国家收益；另一方面，中国自身面临着统一问题与民族问题，因此中国十分关注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规范与价值取向，希望联合国维和行动能够在尊重国家主权与安理会授权的原则下进行。以基于成本—收益的理性分析视角作为切入点，本文试图对冷战后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进行新的解释。

笔者认为，遵循理性主义的分析方法有利于既有解释的相互对话与补充。“责任攸关论”从道义利他立场出发，将中国参与维和行动看做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理性主义的分析方法则强调国家行为首先是利己的，国家战略的实施遵循成本—收益的计算，追求以最小成本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因此，理性主义者提出“工具理性论”和“国际合法性”的解释，认为无论是物质层面还是观念层面，国家行为仍然是遵循成本—收益的理性思维。然而，无论是“工具理性论”还是“国际合法性”，两种解释还没有很好地将物质与观念结合起来，还没有对冷战后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进行实证分析。本文遵循理性主义的分析方法，厘清冷战后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的收益与成本因素，试图分析中国对非洲维和行动的参与是否符合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成本—收益的行为逻辑。

三、理性主义的分析视角

理性主义指的是“理性选择理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各种形式化或非形式化的运用，即那些借鉴微观经济学理论传统所进行的研究工作，或者更宽泛地指那些通过目标寻求型行为来解释外交政策的实证主义研究”。^① 理性选择理论是经济学的主流研究方法，它假定行为体是理性的战略算计者（经济人假设），行为体能够根据成本—收益的权衡追求最佳的策略以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由此，理性选择理论从行为个体的利益出发解释特定环境下个体的或集体的行为与结果。这里所谓的利益即个体的偏好，而个体的偏好通常被研究者视为既定的，这意味着研究者不关心偏好的形成，而把既定的偏好作为研究的起点。^②

理性视角假设，国家行为及行为转变是理性选择的结果。本文探寻理性对国家行为的作用时遵循以下分析思路。^③

1. 国家并不将某种国际社会的规范或规则视为理所当然。国家将国际规则或规范视为外部制度事实，国际制度支持或鼓励遵守规范的行为，而对规范破坏的行为增加成本。

2. 国际制度的强化机制发生作用。具体而言，国际制度奖励遵守规范的行为，惩罚破坏规范的行为，目标国家为了避免惩罚或获取奖励，而遵守规范与规则。上述奖励或惩罚对目标国家的安全与福利产生影响，改

① James Fearon and Alexander Wendt, "Rationalism vs. Constructivism: A Skeptical View," in Walter Carlsnaes, Thomas Risse and Beth Simmons,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2), p. 54.

② 对于理性选择理论中的“利益”或“偏好”，我们可能存在两个误解：一是把“偏好”看做理性的；二是认为行为个体是利己主义者，其所追求的目标是自私的物质利益。实际上，在理性选择理论中，不存在“偏好”是否理性的问题，所谓的“理性”指的是行为个体能够进行“理性”的计算从而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与此同时，行为个体的利益并不局限于利己的物质利益，它也包含利他的、规范的或理念的目标。

③ 参考 Frank Schimmelfennig, "Strategic Calculation and 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 Membership Incentives, Party Constellations, and Sustained Compliance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9, No. 4, 2005, pp. 827 - 860.

变政治行为体获取或维持权力的机会成本。

3. 在衡量强化机制下的成本与收益的基础上, 国家根据自身目标进行政策选择。国家社会化过程中的行为最初由自身界定的政治偏好驱动, 并假定这种政治偏好主要是物质或权力导向的, 包含安全、福利以及寻求获取或维持政治权力等内容, 观念导向的偏好也适当考虑。

4. 关于强化机制发生作用的条件。如果遵守规范能够增加政治效用, 而且适应规范期望的外部承诺奖励大于适应规范的成本, 那么国家将选择遵守国际规范; 反之亦然。因此, 强化机制起作用的条件是: 目标国期望外部承诺的奖励高于适应的成本时, 该国会选择遵守规范; 目标国期望外部承诺的奖励低于适应的成本时, 该国会选择破坏规范或操纵规范。为了避免或减少遵守国际规范的成本, 国家往往选择在战略上对规范进行操作。他们借助现有国际规范为利己主张辩解, 通过修辞使其偏好和行动与规范相符合。

从理性视角出发, 本文假设中国对预期收益较大的非洲维和行动, 将付出更多成本参与其中。本文试图分析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成本—收益”的理性逻辑。从理性视角来看, 冷战后中国参与联合国非洲维和行动是规范适应行为, 理性选择在其中发挥着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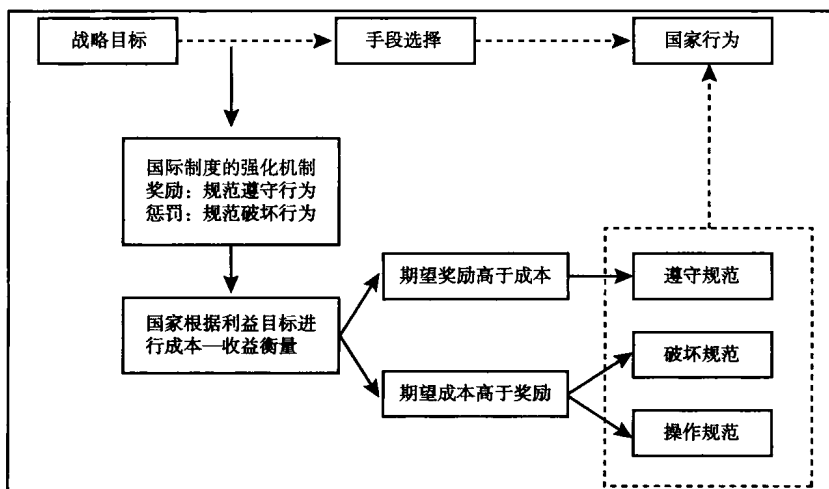


图5 理性选择对国家行为的作用

要作用。在奖励与惩罚的强化机制下，国家根据自身偏好与目标进行成本—收益的衡量。事实上，中国对国际维和规范的适应表现出很大的灵活性，表现为通过规范操作减少成本。

根据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的成本与收益因素，本文对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进行理性逻辑的分析，试图回答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成本—收益”的理性逻辑。一方面，根据冷战后的国家利益与国家战略，笔者归纳出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的各项收益与成本因素，包括政治、经济与军事等方面因素，并且根据其重要性赋予相应的权重。另一方面，在仔细考察冷战后中国参与的各项非洲维和行动的基础上，笔者对每一项行动进行赋值与统计，得出各项收益与成本因素的数据。

四、冷战后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的收益与成本

（一）冷战后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的收益

参与非洲维和行动，是中国加强中非全方位合作的方式与手段之一。从理性视角分析，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有着自身的战略考量，即以合理的成本付出换取重要收益。那么，冷战后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的收益因素有哪些？这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在全面考察基础上，根据2006年中国政府发表的《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本文将作为收益因素的预期目标划分为政治、经济与军事三个领域，又具体细分为六类：（1）政治支持；（2）捍卫主权；（3）地区影响；（4）商业利益；（5）能源资源；（6）军事实践经验。^①下面将对这些收益因素进行分析。

1. 政治目标

首先是政治领域的目标，包括政治支持与捍卫主权两方面。增强中国

^① 关于冷战后中国对非洲战略，参考 Joshua Eisenman, “China’s Post-Cold War Strategy in Africa: Examining Beijing’s Methods and Objectives,” in Joshua Eisenman, Eric Heginbotham and Derek Mitchell, eds., *China and the Developing World: Beijing’s Strategy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M. E. Sharp, 2007), pp. 29–52.